

民族危机与顾颉刚学术思想演变新论*

李政君

〔摘要〕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演变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影响，同时也有其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为学问而学问”理念调整的开始，是“辛未访古”时目睹民生艰难而受刺激所致，与日本侵华直接关系不大。但从思想波动到付诸实践，特别是落实到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的具体活动，才是由日本侵华的影响所致。民族危机不是《禹贡》半月刊创刊的主要原因，但影响了该刊办刊旨趣的转向，其转向的直接触机是1934年8月百灵庙之行让顾颉刚切身感受到了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严峻性。从“古史辨”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转而论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史实，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产物，但二者在历史论证方面并不存在冲突。

〔关键词〕民族危机；辛未访古；百灵庙之行；中华民族是一个；古史辨

〔中图分类号〕K203；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798(2020)-04-0016-08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坚定践行“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念，为此，他曾与胡适产生龃龉。然而，到30年代，他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在《禹贡》半月刊中讨论边疆民族问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用世之心，显而易见。对于这种转变，学界多从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予以解释，阐发其中蕴含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对转变历程的分析，也多以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为重要节点，遵循着抗日战争史的叙事谱系。^①从整体上看，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演变，深受这场事关家国存亡的时代剧变影响。不过，也因这一时代背景的宏大，使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他作为个体的其他际遇，进而造成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清晰。例如：第一，顾颉刚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的理念而开始关注国计民生，是否直接由日本侵华引起？学界似无讨论。如果不是，这一转变如何发生在顾颉刚身上？第二，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不是《禹贡》半月刊创刊的主要动机？如果不是，又与《禹贡》半月刊存在何种关联？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出，无疑具有强烈的经世

色彩，但顾颉刚对中华民族融成“一个”的历程分析，是否如有学者所质疑的那样，与其“古史辨”在“思路中存在着个没有解开的矛盾”？^②换句话说，顾颉刚为“求用”而强调的“一个”，是否与其“古史辨”中坚持已久的民族起源“多元”说冲突？本文拟通过梳理这一时期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演变脉络，解答上述问题。

一、辛未访古与顾颉刚“为学问而学问”理念的调整

顾颉刚“为学问而学问”理念的调整，缘于其“民众”观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号：16KZD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 参见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45—249页。

1929年秋，顾颉刚为求得安心治学的环境，不顾傅斯年诸人强烈反对，毅然入职燕京大学。^①之后，他确实得到了容他读书的环境，在一年内著述达70余万字。^②然而，“快慰之余，致力过猛，一年后遂得怔忡之疾。每一握管，胸漉心浮”。于是，便在1931年4—5月间，与洪业、容庚等人组织旅行团，沿黄河流域“访古”。这一年为旧历辛未，故称“辛未访古”。^③

辛未访古本为调节身心，然而途中见闻，却给顾颉刚带来了巨大刺激。一方面是途中所见古物被破坏，让他发愿“宁毕世不见新出土之古物”，而“不愿其今日显现而明日渐灭”。^④但更重要的，是途中所见民生之艰难：“鸦片、白面、梅毒，肆其凶焰，直欲灭尽人类，而蕴集于斯。兵灾、匪祸，连结不解，人民不识正常生活为何事，而长期颠连于斯……即无伐者知必鱼烂而自亡矣……我辈旅行，所经不广，皆在铁路公路间，交通便，接触现代文化易，耳目多，人犹有所忌惮，而所见则既如此矣；若铁路公路所不经，尚得有天日之照临乎！”^⑤这对顾颉刚思想的冲击，远远超过古物被破坏所带来的影响。他说：“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⑥“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自恨非基督徒，不能信末日之说，祝审判之早临，痛哉痛哉！”^⑦正是这种刺激，造成了其“为学问而学问”理念的调整。

辛未访古所见民生艰难，为何会给顾颉刚带来巨大刺激？对此，“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这种“愁惨暗淡”与顾颉刚既往的“民众”观念形成了强烈反差。

顾颉刚自幼生活于充满书香情调的苏州，由其祖母一手带大，对底层社会的实际状况缺乏足够了解。1913年，时年21岁的顾颉刚还把农村视为可以避世隐居、招邀风月的“桃花源”。^⑧20世纪20年代，更将“近于天真”的民众社会及其文化，视为挽救汉民族衰老的“强壮血液”。^⑨此次旅行的黄河流域，在熟读古书的顾颉刚心里，更因“人物华贵”“城市殷阗”，而“常活跃于梦想之间，若今日青年之遥企欧美”。^⑩可见，在辛未访古前，顾

颉刚因缺乏了解，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始终抱持一种浪漫的想法。

因此，当兵匪蹂躏，毒物猖狂，民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等惨淡景象^⑪，陆续展现在顾颉刚眼前时，浪漫想象与冷峻现实的巨大反差，才对他造成了巨大冲击。他后来断然表示：先前的民众观，是一个错觉，是中了旧诗和旧画的毒，是脱离实际的想象。^⑫可以说，辛未访古扭转了顾颉刚的“民众”观念，使其认识从浪漫想象逐渐回到了相对客观的现实。

辛未访古带来的“民众”观的转变，正是顾颉刚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理念的关键。如他当时致信胡适所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⑬后来，他在回忆中也曾明确说道，“为学问而学问”的“志愿”，20余年未曾变过，

- ①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5—46页。
- ②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8页。
- ③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7页。
- ④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99页。
- ⑤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98页。
- ⑥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58页。
- ⑦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98页。
- ⑧ 顾颉刚：《我在北大》，《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25页。
- ⑨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9页。
- ⑩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98页。
- ⑪ 顾颉刚：《田家读者自传序言》，《宝树园文存》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0页。
- ⑫ 顾颉刚：《农村卫生不可不严重注意——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的大问题》，《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276页。
- ⑬ 顾颉刚：《致胡适》（1934年7月16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5页。

期间“却做了社会运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作了一次旅行的结果”。“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①

可见，辛未访古所见民生艰难，与既往观念形成巨大反差，是顾颉刚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理念的起点，而并非学界常说的九一八事变。从反思纯粹学术立场，到将救国救民的思想具体落实到抗日活动，顾颉刚还经历了一段调整过程。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顾颉刚应《中学生》杂志征稿，撰写《贡献给今天的青年》，仍把青年“到民间去”，让民众“都能识字和明白世界大势，练习做公民”，作为“根本救国之计”^②，亦即他主要关心的仍是“农村破产”等“鱼烂而亡”的内忧。

在顾颉刚调整治学理念的过程中，日本侵华因素确实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虽然很快就加入了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但其《日记》中却记有如下内容：“此次日军暴行事，希白极热心抵制，创设十人团，邀予加入……予为功课压迫，终日无闲，苟非放弃职务，势不能多尽力耳。”^③“自本日起，为救国运动周，停课一星期。每日讨论救国问题。学生不到者以缺席论。予为讲义等务所压迫，只得不去，甚惭也。闻吴校长及许多外国人均参加游行，更愧。”^④这里，顾颉刚虽然“甚惭”“更愧”，但最终还是选择“讲义等务”优先，这说明在他心底，实际还是不愿因事废学。也就是说，虽然辛未访古及九一八事变使顾颉刚意识到需要调整纯粹学术立场，但让他当即放下学术研究，投入救国实践，仍有困难。

同年12月2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与健常（谭惕吾）书曰：‘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⑤顾颉刚对《古史辨》价值的解释不无道理，但与时局相比，轻重缓急之间恐怕连他自己都已无十足把握，否则他不会专门向谭惕吾解释。谭是顾倾慕一生的对象^⑥，因重视谭而担心谭也“笑”他只关心

学术而不顾时局，显然是致函解释的动因。这正说明，在坚持学术研究与投入救国实践的选择上，顾颉刚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两难状态。

1932年10月14日，顾颉刚的日记中更出现了“梦加入义勇军，杀敌人及汉奸，甚酣畅”的记载。^⑦这表明，与不能立竿见影的学术救国相比，直接参与抗日活动的情绪，在他心里日益酝酿，正逐渐占据上风。1933年，当长城抗战再度激起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时，他便向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提出，要通过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以求深入民间”，并于随后取“三户亡秦”之意，成立了“三户书社”，专出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三户书社的成立，标志着顾颉刚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心，具体落实到了抗日行动中。

概言之，顾颉刚产生用世之心，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念，是辛未访古所致；而推动他将“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愿具体落到实处，则是诸多日本侵华事件影响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顾颉刚从“为学问而学问”到忧心家国存亡，表现为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哪一个范畴的问题，与他是否要放弃学术客观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一时期，顾颉刚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是编刊通俗读物教育民众，在其史学研究方面尚无明显体现。

二、百灵庙之行与《禹贡》半月刊办刊旨趣的转变

《禹贡》半月刊因诞生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

- ①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57、359页。
- ② 顾颉刚：《贡献给今天的青年》，《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88—89页。
- ③ 1931年10月12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72页。
- ④ 1931年11月30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85页。
- ⑤ 1931年12月27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93—594页。
- ⑥ 参见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第106—153页。
- ⑦ 1932年10月14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698页。

1934年，所以学界论述其创办动机，也多着眼于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①就整体而言，《禹贡》半月刊确曾对民族危机做出过明显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危机意识贯穿着《禹贡》半月刊的始终。忽略这一点，容易混淆《禹贡》半月刊创刊旨趣与其后期转向问题。

关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动机，顾颉刚在第1卷第1期《编后》中有明确交代，他说：“颉刚七年以来，在各大大学任‘中国上古史’课，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是地理方面……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两校中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课，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同时，谭季龙先生（其骧）在辅仁大学担承‘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我们觉得研究学问的兴趣是应当在公开讨论上养成的，我们三校的同学如能联合起来……学业的进步一定很快速……所以我们决定办这个半月刊。”^②

从为弥补研究古史的不足而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到为选课学生学业进步而联合创办刊物，这一过程说得清晰明白。继之，顾颉刚又说：这个刊物是以三校同学的课艺作基础的，是我们练习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机关，希望读者不要用很严格的眼光来看，也不要对于我们最近的成就有太苛的责望。^③另外，1934年1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编《禹贡》半月刊第一期。”后来，他又补记说“想不到竟有些成就”。^④这些都表明，顾颉刚最初将《禹贡》半月刊定位为学术研讨，并没有为其注入急迫的救亡意识。否则，用学生不太成熟且是古代地理方面的“课艺”去救亡图存，是说不通的。因此可以说，顾颉刚等人在创办《禹贡》半月刊时，或许曾考虑到民族危机，但民族危机并非创刊的主要因素。

民族危机对《禹贡》半月刊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研究旨趣的转向上。这一转向的重要触机，是1934年七八月间的平绥沿线旅行。

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后，策动内蒙东部各盟旗王公“脱离中国”，察哈尔的德王趁机发起内蒙高度自治运动。1934年8月，顾颉刚随吴文藻等组织的“平绥沿线旅行团”抵达百灵庙，与德王及其幕僚会谈3天。通过这次会谈，顾颉刚深切感受到德王等人刻意自外于汉族乃至中国的成见^⑤，

以及这种成见被日本人利用所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严峻形势。他说：从前未到内蒙，不知蒙古情形；现在去了一次，才知其危险。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感怀时局，郁伊难堪，顾瞻同类，尚复醉生梦死，真可痛也。^⑥

和前述“民众”观念发生转变时的情况类似，顾颉刚看到民族问题所造成严重边疆危机的事实，同样冲击了他以往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美好印象。20世纪20年代，受当时较为流行的汉民族衰老说法影响，无论是编撰《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还是因有感于蒙古人信仰之虔诚、体魄之强健而撰写《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顾颉刚都把边疆少数民族视为可以挽救汉民族衰老的“新鲜血液”。^⑦但这种态度明显着眼于积极一面，且包含不少想象的成分，对于实际存在的民族问题，则相对缺乏切实的认识。因此，“百灵庙会谈”中客观展现的边疆与民族分裂危机，与既往观念的反差，无疑会放大顾颉刚的观感，强化问题本身的危机感和解决问题的急

① 亲身参与过相关活动的学者，如杨向奎《回忆〈禹贡〉》、王树民《纪念禹贡学会》、朱士嘉《回忆顾老师对我的教导和禹贡学会》、史念海《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韩儒林《回忆禹贡学会》等（载王熙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均将《禹贡》半月刊的创刊与日本侵华相联系。后来学者相关论述中，不少也延续了这种观点。

② 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68—369页。

③ 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69页。

④ 1934年2月16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61页。

⑤ 参见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3—114页。

⑥ 顾颉刚：《致胡适》（1934年9月25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487页；《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65—366页。

⑦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共3册，与王伯祥合著，胡适校订，1923—1924年陆续出版，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发表于1925年，收入《宝树园文存》第4卷。

迫感。如会谈期间，他就在致其夫人殷履安的信中表示：“我如果牺牲了自己，能使汉蒙感情融洽，能共御外侮，我也就牺牲的值得了。”^①

“百灵庙会谈”发生在1934年8月，而《禹贡》半月刊办刊旨趣向边疆民族问题的明显转变，正出现于此。例如，在1934年2月撰写的《禹贡学会简章》中，顾颉刚对该学会的定位还是“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②；在1935年3月撰写的第二份《简章》中，便改为“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③。另外，1935年年初，顾颉刚让侯仁之翻译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部分章节和《蒙古的王公、僧侣和平民阶级》一文，后载于《禹贡》半月刊，而发表这些“分析‘东满’的蒙、汉、满情况和夹杂在期（其）间的苏俄、日本等外部势力交织的复杂情况”的文章，目的即为“引起国人对东北和满蒙问题的关注”。^④1936年，顾颉刚撰写《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不仅倡导边疆学研究，更明确提出：竭其献曝之诚，以为谋国者告焉。^⑤同年7月，《禹贡》半月刊开始编辑出版边疆问题专号。1937年，他在《禹贡学会工作计划》中更明确说，“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窃愿竭弩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之学”。^⑥公开表示“为学问而学问”不足以“应目前之急”。可见，民族危机已经深刻影响了顾颉刚的治学理念。

以上可见，从为考辨古史而研究地理沿革，到因研究地理沿革而创办《禹贡》半月刊，这一思路发展比较清晰，所以，民族危机并不是《禹贡》半月刊创刊的主要因素。以“百灵庙会谈”为重要触机，顾颉刚切身感受到当时中国民族与边疆问题的严峻程度，因而才调整《禹贡》半月刊的办刊旨趣，转而集中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以应救亡之需。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此前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丝毫没有关注，而是关注的程度在前后有明显不同。

大致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经世”思想在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中得到大范围的体现。1935年到1937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设“春秋史”课程，并留下两部《春秋史讲义》。这两部《讲

义》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推崇霸主在乱世保有中原文化之功，贬低“媚外”行为，表现出了明显的“经世”意图。如在评价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时说道：“因为王室衰微，所以造成列国互相争胜的形势；因为列国互相争胜，中原内部不统一而更不安宁，所以又造成戎、狄交侵的形势。要‘攘夷’必先‘尊王’，‘尊王’的旗帜竖起，然后中原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然后才能对外。所以‘尊王’与‘攘夷’是一贯的政策。”^⑦

1937年5月顾颉刚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禹》，本是一篇讨论古代民族迁徙与地域观念演变的文章，但其结尾却写道：“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观者在，岂得牢守春秋时人之成见，蔑视其人为颡蒙梃味之流乎？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秦汉以来，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中矣。不幸春秋时人之言垂为经典，后学承风，长施鄙薄，遂使古史真相沉霾百世。爰就九州之戎一事寻索禹之来源，深愿后之人考论华戎毋再牵缠于不平等之眼光也。”^⑧这几句话，看似与顾颉刚一贯坚持打破前人古史“成见”的立场相同，但其重点却已不是强调“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而在于说明“戎”与“华”的“界限早泯”，“俱混合于华族中”，强调“多元”如何“汇

① 顾颉刚：《致殷履安》（1934年8月13日），《顾颉刚书信集》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6页。

② 顾颉刚：《禹贡学会简章》（一），《宝树园文存》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9页。

③ 顾颉刚：《禹贡学会简章》（二），《宝树园文存》第1卷，第391页。

④ 参见侯仁之：《山高水长何处寻——追忆颉刚师二三事》，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33页。

⑤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215—216页。

⑥ 顾颉刚：《禹贡学会工作计划》，《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227页。

⑦ 顾颉刚、董书业：《春秋史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8页。

⑧ 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139页。

流”。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考后来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问题。至此，“经世”观念对顾颉刚的影响，已经从编刊通俗读物扩展到了史学研究领域。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的学术关联

边疆与民族的历史问题，自始便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但1939年他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出发点，却是非学术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解决“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现实问题。顾颉刚的解决策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已经露出端倪。七七事变后，在西北地区近一年的实地考察，让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态度，即：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宗教信仰等复杂原因，边疆各民族之间，边疆民族与汉族、与中央政府之间，本就存在严重隔阂；而“民族”“民族自决”“中国本部”等理论、概念的传入，加之侵略者的恶意利用，又给这种隔阂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在边疆民族中就形成了多元的民族观念，造成了强烈的“非汉族”“非中国”的“离心”意识，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分裂危机；要消除分裂危机，就必须重塑一种新的民族观念，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来消解时人的多元观念。^①基于此，他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提出：中国境内的人民，自春秋战国以降，在血统上早已错综万状，在文化上也已涵濡融合，“血统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中华民族“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②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费孝通看出了顾颉刚因“抗战建国的需要”刻意回避血统、文化等差异，以求得民族团结的政治意图。所以，他在辨析“state”“nation”“race”“clan”等概念后提出：“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但混合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也“决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③此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关讨论的基本观点。应该说，费孝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及其在“中华民族”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学界已有较详尽研究，无需多言。^④这里要讨论的，是时隔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古史辨”之间，在“顾颉刚的思路中存在着个没有解开的矛盾”。这种“矛盾”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史实层面，顾颉刚的“古史辨”意在辨伪，“中华民族是一个”又极力论证民族融合，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古人伪造古史所反映的，正是民族融合的事实；第二，如果顾颉刚意识到“民族出于一元”的虚构象征着古代各族的“联宗”，那“古史辨”将之“拆成一堆垃圾”，和他后来论证中华民族已经融成“一个”，在学术取向上就存在矛盾。^⑤

这两方面的“矛盾”存在与否，对于正确认识顾颉刚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矛盾”真的存在，那么抗战时期顾颉刚的研究就不仅仅是走向学术救国道路的问题，而是为政治需要改变了其根本的古史观点，放弃了客观的学术立场。

首先，在“古史辨”中，顾颉刚是否真的没有

- ①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前，顾颉刚已有不少文章体现了这一思路，如《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文化工作》《中华民族的团结》《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考察西北后的感想》等（均载《宝树园文存》第4卷）。
-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94—106页。
- ③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33—140页。
- ④ 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81页；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 ⑤ 参见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47—249页。

意识到伪古史系统这座“琉璃宝塔”所象征的古代各族的“联宗”？恰恰相反，顾颉刚不但意识到了，而且这正是他证明古人伪造古史的重要证据。例如，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第六部分《种族融合过程中造成的两个大偶像》中，他先论述了春秋以降的“种族融合”现象，然后分析说：“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他们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颡项，这是一支；黄帝生玄器，玄器生蟠极，蟠极生帝誉，这是又一支。靠了这一句话，颡项和帝誉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①这里所要揭示的，正是战国、秦汉间人伪造古史来追认共同祖先的现象。此类例证尚多，无须过多枚举。^②诚然，当时顾颉刚没有像全民族抗战时期一样，对中华民族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个”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但这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而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古史辨”的中心问题。对此，今人不应求全责备。

全民族抗战时期，当“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为问题时，顾颉刚的关注点随之转移，开始论证民族融合问题。应当注意，顾颉刚对民族融合的历史论证，存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春秋战国时期。在他看来，春秋以前，民族融合虽也存在，但其大规模出现，则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才“生根发芽”。至于春秋以前，他依旧毫不避讳地说“周国本是夷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种族”，“春秋时期许多蛮夷”，等等。^③这就说明，即便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论证中，顾颉刚也没有将“一个”的观念强加于上古中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为论证“一个”，而改变“古史辨”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态度。

以上可见，顾颉刚对民族融合问题的认识，本就存在两方面事实：一是史书记载上，民族多元起源的事实，在东周、秦汉间，被伪造成“出

于一元”；一是客观历史上，在同一时期，多元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事实。“古史辨”重在揭示造伪原因，以还原春秋以前的多元真相；“中华民族是一个”则重在论述春秋以后的融合历程。而多元真相被掩盖的动因，正是民族融合的时势所需。二者是一事的两面，在顾颉刚的思路中不存在冲突。

其次，“古史辨”打破“一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建构“一个”之间，在取向上是否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厘清在顾颉刚眼中，促进民族融合、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就有明确回答。《顾序》在指出“三皇五帝”的帝系乃古人伪造，古代各民族并非互相统属后，曾自我澄清说：“如有人说：中国人求团结还来不及，怎可使其分散。照你所说，汉族本非一家，岂不是又成了分离之兆。我将答说：这不须过虑。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开，即五胡、辽、金诸族也无法在汉族里分析出去了。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决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④

可见，在顾颉刚看来，维系民族团结所依靠的，应该是被“古史辨”所还原的历史真相，即多元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客观事实，而决不应靠“替古人圆谎”。在此之前，1932年顾颉刚致信牟润孙时也曾说：“我们说汉族是许多小民族团结而成，固然打破了‘炎、黄神明之胄’的旧说，实际上却不会消失我们民族的自信力。何也？为了成就一个大民族，已经作了极大的牺牲，此牺牲即值得我们树立其自信力而为团结之张本也。

- ①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页。
- ② 参见罗新慧：《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考察》，《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 ③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95—96、110页。
-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1页。

且能知我们非炎、黄遗胄，则我们不必存虚懦之气矣。能知我们过去之牺牲，则知现在如不奋斗图存，即为我祖宗之不肖子孙矣。如此，不但不足以消失我们的自信力，实更足以激起我们的民族精神，而得理性之信仰。”^①此处更为清楚地解释了为何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资源应是多元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历史真相，即让人们知晓古人为“成就一个大民族”所付出的“极大的牺牲”，“更足以激起我们的民族精神，而得理性之信仰”。

《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突出之处，是对随意使用“民族”“种族”等概念的警醒。前文已述，在顾颉刚看来，这些概念的误传、误用，使边疆民众在民族现状问题上形成了多元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非汉族”“非中国”的意识。因此，他化解分裂危机的策略，是通过论证“一个”，来消释边疆民众心中的民族多元观念。但这里的消释多元观念，不是回到或重提“民族出于一元”的老调，而是在肯定中国境内诸族起源多元的前提下，论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血统、文化早已涵濡融合，形成了客观存在的“同一体”的民族意识，形成了“一个”先有“实”后有“名”的“民族”，即“中华民族”。^②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既是唤起民族团结的精神资源，又是客观历史事实，是从多元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获取团结的意志。这种策略和上述《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主张通过历史真相而非伪古史说来维系民族团结的观点并无不同。也因此，顾颉刚才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批评那些认为谈民族历史问题会“召分裂之祸”的人是讳疾忌医，进而主张“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的历史”。^③

四、结语

从整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演变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影响，同时也有自身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一，顾颉刚从“为学问而学问”到走向抗日的过程中，实际存在两次调整：第一次是1931年四五月间的辛未访古，让他产生了经世济民之心，开始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理念。所提“根本救国之计”是“到农村去”，教育民众“做公

民”，与日本侵华直接关联不大。第二次调整是将经世济民之心真正付诸实践，并具体落实到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的活动中，这才是九一八事变及之后日本系列侵华事件所致。从研究古史到编刊通俗读物，主要是顾颉刚个人精力在不同领域的分配问题，抗日救亡意识尚未影响到他的史学认知。

第二，民族危机对《禹贡》半月刊的影响，不在其创刊动机，而在其办刊旨趣的转向上。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初衷，是研究地理沿革；同年七八月间的百灵庙之行，让他切身感受到当时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严峻性，随即调整《禹贡》半月刊办刊旨趣，大量讨论边疆与民族问题。抗日救亡意识也由此逐渐在顾颉刚的其他史学著述中得到体现。

第三，从“古史辨”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观念，转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史实，是民族危机影响下的结果。不过，二者在历史论证方面并不存在冲突：“古史辨”重在还原其多元起源的真相，“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在论述其由多元融成“一个”的历程；对于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资源，二者都认为应从民族融合的历史真相中寻求，而从未依靠过“民族出于一元”的伪说，更没有为了维系团结而虚构史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101）

- ①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8页。
-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05—106页。
- ③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04—105页。